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黄圣平◎著——

DANG DAI XUE ZHE
REN WEN LUN CONG

郭象玄学研究

——沿着本性论的理路

GUO XIANG XUAN XUE YAN JIU YAN ZHE BEN XING LUN DE LI LU



華齡出版社

B235.6

1

2007

郭象玄学研究

——沿着本性论的理路

黄圣平 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象玄学研究:沿着本性论的理路/黄圣平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4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6辑)

ISBN 978-7-80178-439-1

I. 郭… II. 黄… III. 郭象(252~312)—玄学—研究 IV. B2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6582 号

书 名: 郭象玄学研究——沿着本性论的理路

作 者: 黄圣平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34)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25.00 元(全十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向秀《庄子注》别本略论	(4)
一、向注别本问题的提出	(5)
二、向注别本可能是存在的	(7)
三、向注别本即是注原本	(12)
四、“盗窃说”和“述广说”是可以并存的	(14)
第二章 《庄子序》作者辨正	(17)
一、史料的剖析	(17)
二、思想的比较	(22)
三、《庄序》作者略探	(29)
第三章 本性观	(33)
一、“本性”的内涵和特征	(33)
二、本性的产生、实现、离失和复归	(38)
三、对郭象本性论系统的几点说明	(47)



第四章 神器观	(53)
一、“神器”与国家政治和名教	(53)
二、“神器”解	(57)
三、对郭象神器观的几点说明	(74)
第五章 玄冥观	(78)
一、郭象“无待”说阐释	(79)
二、无待与玄冥	(85)
三、独化与玄冥	(91)
四、存在的主要矛盾：有待与无待	(95)
第六章 逍遥观	(98)
一、情态性自由简说	(98)
二、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	(101)
三、有待的逍遥和无待的逍遥	(104)
四、对郭象逍遥观的几点说明	(113)
第七章 圣人境界观	(116)
一、体道与圣人境界	(116)
二、游外与冥内	(121)
三、迹与所以迹	(126)
第八章 真知观	(131)
一、生不由知与天然真知	(132)
二、成心真、妄与知恬交养	(136)
三、境界真知与顺任群知	(140)

第九章 政治历史观	(146)
一、郭象政治哲学的主题	(146)
二、对圣王治道的理论建构	(148)
三、无为之治与所谓“绝冥之境”	(154)
四、“德”之下衰与退化史观	(158)
第十章 无为观	(164)
一、任性自动与守职而为	(165)
二、游外冥内与无待逍遥	(169)
三、无为之治与“有为”之治	(171)
第十一章 名教观	(176)
一、名教的内涵与性质	(177)
二、名教(名)即自然	(181)
三、越名教(动)而任自然	(185)
四、名教之治与圣人之迹	(189)
第十二章 郭象玄学体系析评	(195)
一、矛盾之一:批判与超越	(196)
二、矛盾之二:本性与心性	(203)
三、支遁对郭象逍遥思想的批判	(207)
四、郭象本性论体系略评	(212)
附录 郭象玄学的内在矛盾与《庄子序》的作者问题	(216)
参考资料	(246)

前 言

郭象,字子玄,河南人,约生于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死于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是西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关于郭象的生平,史料不多,仅《晋书》、《世说新语》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等史籍中略有记载;其著述,据记载,有《庄子注》、《论语体略》、《论语隐》、《老子注》、《致命由己论》和碑论12篇等,但除《庄子注》外,余皆佚,仅《论语体略》、《老子注》等尚辑有部分佚文。在近代以来,由于郭象思想的重要与深刻,学界已经对其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本论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一个新的、本性论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以力求对他的思想作出一个较深的把握。

前人对郭象的研究,似乎杂乱,但细加分析,可以看出其实乃有迹可寻。在1949年以前,较有影响的研究者是汤用彤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他们分别从本体论和新实在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大。1949年后,大陆的郭象研究,就其理路上来说大多是对汤先生思路的继承、发展进而有所修正,从而提出了郭象哲学是贵无论、崇有论、现象主义和本性论等多种看法,而冯友兰先生则以无无论来作为新时期他对郭象思想的把握;在评价或曰参考体系上则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具体地说,在前期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参照系,对郭象思想多所批评,而在后期则出现了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参照系的情况,从而也得出了一些与前较为不同的结论。至于港台



的郭象研究,其开拓者是牟宗三先生,其对郭象思想从玄理亦即精神境界角度所做的分析在港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一直延续了下来。显然,在郭象研究中,这些不同的分析角度和参照体系及其所带来的有关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评价都是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如何理清它们构成郭象研究的重要问题;继承前人的观点,有所发展和扬弃,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而达到对郭象思想的新的把握呢?另外,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和《庄子序》作者的考证问题也是长期的难题,在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上能否略有前进呢?总之,问题很多,需要也值得我们对它们作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以《庄子注》的原材料为本,试图通过对原材料的分析和还原以达到对郭象思想本身之内在结构和本质的揭示,然后从本性论的角度对其内容分为相关的具体问题一个个地研究;所谓本性论,其之问题与理论内涵的提出,一方面是前有所本,而另一方面则应该说亦是在对郭象思想本身予以还原的过程中才得到确认与深化的。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面对原材料本身,我们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需要有必要的“悬置”,或曰打入括号之中,但,由于学术研究本身的延续性和超越性,前人的相关研究确实构成我们分析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在原材料还原之基础上所作的结论最终也必须回到学界的研究成果之上,使得我们能够沿着前人的研究将对郭象思想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下去,能够接着前人讲下去。这样,相应地,在论文中我们往往大量地引用《庄子注》的原文和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思考就直接在对所引材料的分析之中展开。在分析时,我们努力做到尽可能不去故意地扭曲所引材料的原意,努力做到所引材料和相应结论的和合与统一。在分析前辈学者的学术观点时,作者或对其具体观点有所批判,但就个人心态而言,应该说对他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充满赞赏与感激。

本论文将以对《庄子注》和《庄子序》之作者的考证开篇,首先试图对此两大问题提出作者自己个人的看法;接下来,由于论文以本性

论为对郭象思想的概括,故何为本性和本性论,其与郭象思想之间的关系如何等,它们将是接踵而至的基本问题,而我们将在本性观一章中对此尽力加以清晰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郭象的神器观、玄冥观、逍遥观、圣人境界观以及名教观和政治历史哲学等所作的分析将构成本篇论文的主体内容;最后,我们将对郭象思想体系中的内在矛盾加以分析,它将有助于我们看清郭象思想为支遁等人之佛学思想体系予以代替的必然性,有助于我们对郭象玄学的全面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郭象思想给出一个合适的评价;至于所附论文《郭象玄学的内在矛盾与〈庄子序〉的作者问题》,它是笔者对李耀南先生《难“〈庄子序〉非郭象所作说”》一文所作的具体回应。该文深化了我们对《庄子序》作者问题的研究。

对郭象思想的研究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郭象哲学在魏晋玄学中地位极为重要,故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应有助于我们对玄学思想的深入和整体的把握;玄学和郭象的哲学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故对郭象思想的分析显然应有助于我们思维水平的提高;就对现实人生的意义而言,由于郭象的思想涉及到个体与整体、名教与自然和魏晋风度与逍遥观等很多问题,故他的理论思考或亦能对我们的现实人生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斯人远矣,但为了复原他的思想,通过他所留下来的材料之迹,倘尽心尽力,我们或亦能够尽可能地去贴近他的思想本身,去让他的生命存在之所以迹得以展开和发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还是存在着难以避免的误解、隔膜和成见?是否还是避免不了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距离,以及由此而来的扭曲与失真?此耶彼耶?是耶非耶?读者鉴之。

作者

2006.2.15



第一章 向秀《庄子注》别本略论

本章提要：

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向注别本的存在与否可以成为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关键。从史料比较和逻辑分析的结果看，向注别本是极有可能存在的。在向、郭二家《庄子注》的关系上，所谓“述广”说和“盗窃”说是能够并存的，我们应把今本《庄子注》视为向、郭两人共同的作品。

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并曾长期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①。在讨论中，由于立场的差异和资料的欠缺，一部分学者，根据《晋书·郭象传》，主张“盗窃说”，认为郭注是郭象窃向注以归己有，应把今本《庄子注》的版权判归向秀，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述广说”，认为《晋书·向秀传》所载郭注是对向注“述而广之”的说法才是真确的，反对“盗窃说”。显然，讨论的双方实际上都认可了一个理论假定，即以“述广说”和“盗窃说”是非此即彼、绝对排斥的。但这一预设的前提能否成立呢？二说能否并存呢？

^① 在《魏晋玄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312页）中，李中华教授对此问题的研究历程、代表性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读者可以参考之。



本文拟从向秀《庄子注》别本(简称向注别本)的角度对此略加探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向注别本问题的提出

魏晋以前,《庄子》长期默默无闻,汉人论道家多言黄老而少言老庄;到了魏晋之际,因应着时代的需要,《庄子》突然流行起来,取代《老子》,成为当时士人关注的中心。因着《庄子》的流行,其注家也随之多了起来。继孟氏、崔撰、司马彪等同时或之后,向秀和郭象也先后注解《庄子》,分别有各自的《庄子注》,这是中哲史上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就向郭二《庄子注》,同一部《晋书》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依《晋书·向秀传》,其记载是: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世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依《晋书·郭象传》,其记载则是: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这两种记载,有一致处,如都承认向秀在郭象之前注解过《庄子》,且向注与前注比较,在内容上别出一格,“发明奇趣”、“妙演奇致”等,在流行后亦甚有影响,“振起玄风”、“大畅玄风”云云;但比较起来,二者的差异较为明显:(1)《向秀传》认为向秀注《庄》“已成”,已流传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世也”),而《郭象传》则认为向秀注《庄》未成(“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尽管有“别本迁流”,但“其义零落”,没有于向秀生前在社会上流行并发生影响(《郭象传》所言之秀注的影响当是秀注别本所致,与原本无关);(2)在向、郭二注关系上,《向秀传》认为郭注是在向注基础上的“述而广之”,有推广、提高和发展,当然其义非一而有别,《郭象传》则认为郭象是窃向注为己有,不过补《秋水》、《至乐》二篇注,易《马蹄》注,其余只是点定文句,并“其义一也”;(3)在郭象其人上,《郭象传》认为象“为人行薄”,《向秀传》则对此未加评说等。这些一致和差异处,学界都曾注意到,并对它们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讨论;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差别处未曾被注意到,且有助于向、郭二注问题之解决呢?

仔细比较《晋书》二《传》,我们认为,这个差别之处是有的,二《传》所指示的向秀《庄子注》的流行过程是不同的。

根据《向秀传》,向秀因“历世才士”虽观《庄》而“莫适论其旨统”,故作《庄子注》,其注因“发明奇趣”,故成书后在社会上流行且影响深远,“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世也。”一直到了惠帝之世,郭象在流行向注本的基础上才“述而广之”,推出自己的《庄子注》,以与向本并列;而在惠帝其时之前,向本是一直单独流行的。因此,《向秀传》所提出的向秀《庄子注》之流行过程,用箭头表示,应该是:向秀成书、向本流行 → 郭象在向本基础上“述而广之” → 郭本出,二本并存 → 向本佚失。在这条向秀注本流传线路中,不存在向注别本。

根据《郭象传》,向秀注《庄》,尽管其注文“妙演奇致,大畅玄



风”，但未曾注完即“早卒”且“其义零落”，不曾在社会上流行，但有别本迁流。郭象见及向秀注本，以其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有，并略作“补充”和“点定”即在社会上推出。只是在郭本流行之后，向注别本流出并与郭本并列，才揭开了郭象“盗窃”向注的事实和他的“为人行薄”。在《郭象传》中，向秀《庄子注》的流行过程，用箭头表示，则是：向秀早卒，其义零落→郭象窃为己有→郭本流行→向别本出，二本并存→向本佚失。在这条向注本流传线路中，存在向注别本。

显然，在这两条不同的流行线路中，向注别本的存在与否是一个关键。如果不存在向注别本，向本已先于郭本在社会上流行，郭本则只能是在向本基础上的“述而广之”而不可能是“窃为己有”，《向秀传》的记载就是确实的，应为郭象恢复名誉；相反，如果向注别本是存在的，且如果向注别本即是向注原本（在内容上），那么，不论它与郭注本相比较的具体差异如何，它都证实了郭象“为人行薄”窃向注原本为己有的记载，两《传》记载的其它差异亦应因之而有新的考虑。那么，向注别本究竟是否存在呢？它与向注原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二、向注别本可能是存在的

从史料的比较和逻辑的剖析中，我们认为，能够推断出《晋书·郭象传》中所谓的向注别本极有可能是存在的。

先看史料的比较。向秀《庄子注》宋代早亡，不过其中部份文字由于人们曾加以引用，因而还可查考，据之也可与郭注比较，了解彼此的异同。在这方面，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均有重要成果，例如王叔岷先生即指出：

“今据《庄子释文》、《列子注》及他书所引，详加纂辑，得向有注郭无注四十八条，向郭注全异者三十条，向郭注相近者三十



二条,向郭注相同者二十八条。”^①

在向注本佚失之前,尤其自东晋至唐,二本是并行于世的。当时的学者,如张湛、陆德明等,在引用时,或二注兼引,或单引郭注,或单引向注,说明二本在当时就是不尽相同的。这些不同之处,有些地方差异是很大的。如《庄子·应帝王》“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欤?众雌而无雄,又奚卵焉?”句,向秀注文是“夫实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犹有雌而无雄耳。今吾与汝虽深浅不同,然俱在实位,则无文相发矣,故未尽我道之实也。”^②全注近五十字。同一句,郭象则仅注“言列子之未怀道也”^③八个字,差异很大。又如《庄子·人间世》“易之者,嗥天不宜”句,向秀注文是“嗥天,自然也”^④重在注解“嗥天”一词之义,而郭象的注文则是“以有为为易,未见其宜也”,重在注说“不宜”之因。二注所注同一句,但所意指各有不同。这种情况,在二注的比较中还能举出一些。总合而论,就现存向、郭注文的对勘,“向有郭无共四十八条,向郭注全异者三十条”,合起来达七十八条,占所辑二注总数一百三十八条的近百分之六十,故王叔岷先生有言:“列此明证,然后知郭注之与向注,异者多而同者少,……就余所考得者,已足证《世说·文学篇》、《晋书·郭象传》所言之不足据信也。”^⑤但细查此向有郭无之四十八条和向郭注全异之三十条,则正如近人杨明照先生所言,“多为短句小文”,其义亦多

① 王叔岷:《向郭庄子注异同考》,《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卷4期。

② 引自《列子·黄帝篇》张湛注。

③ 比较今本《庄子注》与《列子注》等古籍所引郭象注文,内容一般相同,可断定今本《庄子注》即古郭象注本。王葆玟先生认为今本郭象注在唐初曾经被当时士人用向秀注予以改编的看法缺乏理论依据。理由很简单,因为日本高山寺所藏《庄子注》(其乃南朝写本)与今本郭象注文对照,其内容一般相同,故可由此类推,得知今本《庄子注》即古本《庄子注》也。本文所引郭象注文均出自今本《庄子注》,其后不另注出。

④ 引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

⑤ 王叔岷:《向郭庄子注异同考》,《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卷4期。



“只在诠释字句”^①，故简单的数字比较易导致表面化的结论。且就此不论，二注本亦有大量的相近和相同之处。如《庄子·应帝王》“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几也”句，向秀的注文是：

“德几不发故曰杜也。萌然不动，亦不自止，与枯木同其不华，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渊嘿。渊嘿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即谓之将死；见其神动而天随，便谓之有生。苟无心而应感，则与变升降，与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耳，岂相者之所觉哉！”^②

同一句，今郭象庄注本分为两句分别注解。在“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句下，郭象注道：

“萌然不动，亦不自正，与枯木同其不华，湿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渊默。渊默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为而自尔，一也。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即谓之将死；者见其神动而天随，因谓之有生。诚能应不以心而理自玄符，与变化升降而以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故非相者所测耳。此应帝王之大意也。”

在“是殆见吾杜德几也”句下，郭象注道：

① 杨明照：《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燕京学报》第28期。

② 引自《列子·黄帝篇》张湛注。



“德几不发曰杜。”

比较二注文,显然相同乃至雷同之处是巨大的。郭象的注文,不过是将向秀并在一起的注文拆开,以其注文的首句作为次句原文的注文,而在首句的注文共一百三、四十来字中,相雷同的即占了一百字还多,略有差异的不过是后面十来字,且在意义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所异者唯语气罢了。就此句注文而言,可以说郭注与向注是近乎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的也是有的,《庄子·达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镒铢”句,向秀注文是:

“累二丸而不坠,是用手之停审也。故承蠲所失者,不过镒铢之间耳。”^①

郭象注文是:

“累二丸而不坠,是用手之停审也。故承蠲所失者,不过镒铢之间也。”

二者相较,差异只在句尾“耳”、“也”虚词之别,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这些完全相同的注文,依王叔岷先生的考证,共有二十八条,再加上二注相近的三十二条,共六十条,占注文总数的近百分之四十;如果撇开向有注郭无注的四十八条(因其内容主要是简单的字义解释,故可能为郭象所删弃),则现存二注的同异之比是六十条比三十条,相同和相近的注文正好是相异注文的一倍。由此,我们可以断定

^① 引自《列子·黄帝篇》张湛注。



二注本在内容上的重合是十分惊人的^①。

对此应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它证实了向注别本极有可能是存在的。如前已论，如果《晋书·向秀传》所记载的向注本流行线路是确实的，那么向注原本已于郭本之前流行，则不存在所谓的向注别本，现存的向佚注文乃是向注原本所有。由于以上史料比较所示的向注佚文与郭象注文间在内容上的大量相近乃至雷同，则郭象就是直接地把当时已在社会上流行的向注原本中的大量内容基本上未经改变就作为己注在社会上推出并与向注原本并列流行。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由于二注本在内容上的重合比例过高，即使在当时也许缺乏严谨的著书体例，存在着普遍的抄书之情况下，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②。向秀是玄学名士，理论名家，社会影响很大。其《庄子注》尚在他生前即已问世，则必为当时已重新活跃起来的清谈名流们大量地注意、熟悉和理解；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把已在社会上流行并得到社会认可的向注原文大量照搬为己注，从郭象的角度考虑不太可能，即使可能，从二注并存于社会中流行来看，社会应该也不会接受；再进一步，即使社会接受，向秀有二子，“纯字长悌，位至侍中。悌字叔

① 苏新鋈在《郭象庄学平议》（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41页）中，通过史料比勘，认为“盖就已辑得之秀注遗文计，凡一三八则，其中有象注可资比较其异同者，共九十则。而在此可比计异同之九十则注文中，其文之‘义’、‘辞’皆同，或类同，或至少其义是相同者，殆有六十八则，占百分之七十五强。故此若视为一极自然的抽样考核论，则象注之‘义’、‘辞’相同，或类同于秀注者达四分之三以上，即至少已可据论郭象之庄学，殆若有四分之三乃直接源于向秀而来者也。”（苏氏乃王叔岷先生之弟子，此文亦曾经王先生审核，其结论应是可信的。）另外，《庄子·应帝王》之“列子见季咸”一节，今本郭注总数二十二则，与向注雷同及仅仅“点定文句”者达十七则，相同比更在十分之八以上。

② 余嘉锡先生在论及古书撰作者时指出“郑玄、赵歧、杜预注经皆只称氏，惟何休、何晏、王弼称名”，“今虽不能考其（著者自署其名）所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1页）；魏晋士人均甚为重视“立言”，重视要“成一家之言”以求不朽，且何晏在主编《论语集解》时即很注意著作权的问题，故学人之著作权观念的发生与发展或即就在此魏晋之际？要之，在郭象所处的西晋时期，学人中著作权的观念应该已经较为流行了。